

华文文学
跨域的建构

刘登翰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华文文学

跨域的建构

刘登翰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华文文学 跨域的建构 / 刘登翰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7.6

ISBN 978-7-211-05523-4

I. 华… II. 刘… III. 中文 - 比较文学 - 台湾省、福建省 IV. I209.9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学 (2007) 第 092288 号

华文文学 跨域的建构

HUAWEN WENXUE KUAYU DE JIANGOU

作 者: 刘登翰

责任编辑: 丁 翔 陆耀东 陈晓红

出版发行: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591-8753316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 211@fjpph.com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 350001

印 刷: 福州华悦印务有限公司

地 址: 福州市南平东路鼓楼工业区

邮政编码: 350012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46.25

字 数: 936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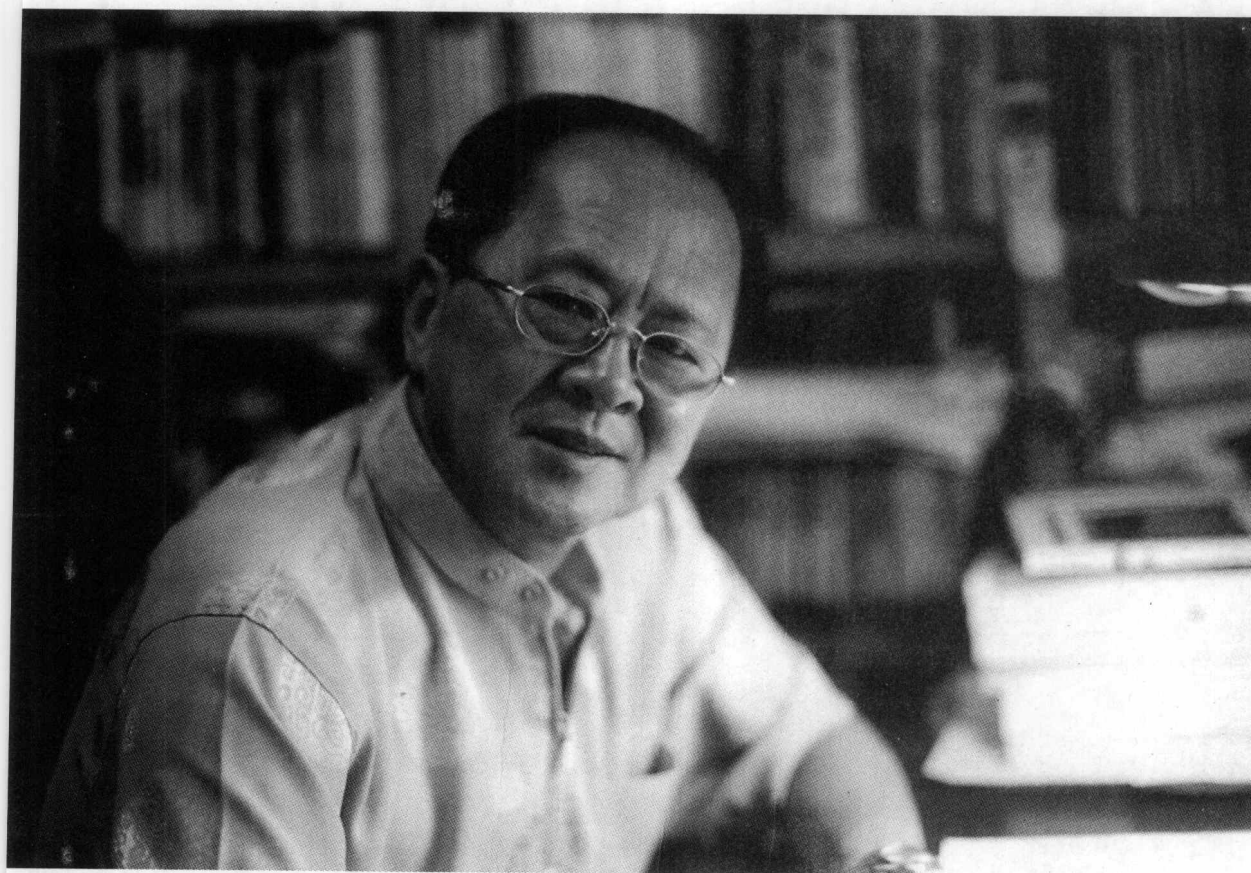
印 数: 1 - 1000

书 号: ISBN 978-7-211-05523-4

定 价: 72.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刘伏宝 摄

刘登翰 福建厦门人，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返闽后在三明地区基层文化部门工作。1980年调到学术岗位，任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研究员。最初写诗、散文和报告文学；转向学术后，先做当代新诗研究，后做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主编《台湾文学史》、《香港文学史》、《澳门文学概观》、《百年美华文学史论》等，个人或与人合作的学术著作还有《中国当代新诗史》、《文学薪火的传承与变异》、《台湾文学隔海观》、《彼岸的缪斯——台湾诗歌论》、《中华文化与闽台社会》等十余种，另外还出版了诗集、散文集、报告文学集和书法集等多种。

代序：

华文文学：跨域的建构

“华文文学”——这样一个整合性的概念，是从什么时候，在一种怎样的思考背景上，被提出来的？相信对于关心华文文学学术发展的研究者，这是一个尚未被充分重视的有价值的问题。

在中国大陆，一般都认为，“华文文学”的正式命名，始于1996年在江西庐山举行的第六届学术研讨会上。这里有一个曲折的过程。中国近代以来特殊的历史遭遇，使中国南部濒海的疆域——台湾、香港、澳门，在东西方殖民者的侵占下，处于一种政治上与母土的“碎裂”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两大阵营对垒和新中国成立，加深了这些地方与祖国大陆的政治对峙和文化的“盲视”。因此，当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无论世界还是中国大陆政治格局的变化，都使对峙的双方首先从文化上（文学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有一种彼此重新“发现”的喜悦与惊诧。最初是少数有条件接触到香港、台湾文学资料的研究者，“探险”似的进入这一领域。但到1982年于广州暨南大学召开的第一届香港台湾文学研讨会，标志着这一研究逐渐从零散的个人的学术行为，转化成为有计划有组织的学科性建设的开始。但很快人们就意识到，最初被作为“台湾作家”研究的诸如聂华苓、於黎华、白先勇等，他们更确切的身份是从台湾移居美国的美籍华人作家；而与此同时，正在复苏的东南亚华文文学，也进入与东南亚诸国交往密切的广东、福建学者的视野。于是，在1986年于深圳太学召开的第三届学术研讨会，便在“台湾香港”（第五届的中山会议增加了澳门）之后，添了一个“暨海外华文文学”，以示研究视野的拓展。然而，“台港澳文学”是中国文学，而“海外”则是别国的文学，二者并置不仅拗口，也引起一些争议。于是，便有了庐山第六届会议以“世界华文文学”的易名。易名本应是对对象的一种重新定位和诠释，然而“华文文学”在中国大陆的命名，有着这样一个长达十余年的学术背景，重新命名之后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实际上并未脱离原先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框架和轨迹，无论观察与分析的对象、视角或方法，并没有产生具有结构性意义的改变。

在海外，对漂离母土的华人及其族裔文学的关注和讨论，从很早就开始。但大都是对于具体作家创作的批评和介绍，还不是我们今日所说的带有整合性意义的“华文文学”研究。手头没有详细资料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不过我以为，1989年在新加坡举行的“华文文学大同世界国际会议”，是较早的重要一次。“大同世界”的会议主题，和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在内的会议参与者的广泛性，使它具有了整合性的视野和意图。在这次会议上，^①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华文文学整合性建构的论题，诸如“多元文学中心”、“双重经验书写”等等，对后来华文文学的研究实践，产生深远影响。稍后，美国柏克莱大学的亚裔系，连续两届以“开花结果在海外”为主题，举办了有众多国家和地区作家和研究者参加的华人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虽然如会议主题所标示的，关注的重心是“开花结果在海外”的华人文学书写，但参与者的广泛性和论题的深入是前所未有的。最近的一次在2006年春天，由王德威主导的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邀请了来自美国、台湾、香港、马来西亚的华文作家以及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生，举行了一场人数虽不多但题意深远的“华语语系文学研讨会”，从另外一个视角，与中国大陆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展开对话。其论题包括中国经验与中国想象在地域、族裔、社会、文化、性别的移动与转化，华裔子弟移民经验和典籍跨越，翻译与文化生产，多元跨国的现代经验的世界想象等等，对“华语语系文学”这一概念内涵，提出了新的理论阐释。

回顾从国内到海外的华文文学研究，有几点印象值得提出：

一、华文文学是一个发展着的概念。从对其命名到诠释的游移不定，歧义互见，都说明它尚不成熟。这一点从国内到海外，基本一样。不同的论者，不同的视角，常会有不同的诠释。即使同一论者的前后表述，也常有不一致，甚至相左的地方。这是一个新的学科必然经历却又急需走出的过程。

二、国内和海外的华文文学研究，存在着认识层面和操作层面上的某些差异。就其对象而言，国内的研究往往把中国大陆的文学摒除在外。这自然有着“世界华文文学”这一概念缘自“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而来的学科形成的背景。然而，中国大陆本土文学的“缺席”，不仅使号称“世界”的华文文学研究成为一种“不完全”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在世界华文文学格局中，中国大陆本土文学与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华文写作“对话”的缺席。而在海外的华文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中，这种“对话”十分重要，是华文文学研究必须具备的条件。王德威在他的“华语语系文学”观念中，就十分强调这种“对话”，他说：在全球化的时代，“华语文学提供了不同华人地区互动对话的场域”，“华语语系文学所呈现的是个变动的网络，充满对话也充满误解，可能彼此唱和也可能毫无交集，但无论如何，原先以国家文学为重点的文学史研究，应该因此产生重新思考的必要”。^①实际上，由“对

^① 王德威：《华语语系文学：边界想像与越界建构》，载《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5期。

话”所呈现出的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华文创作的差异，正是它们获得独立生命和价值所在。

三、国内的研究往往不将华裔的非华文写作包含在内。在国内的学科谱系中，华裔的非华文写作，主要是外文系的学者关注的对象，因此，便有了“华文文学”还是“华人文学”的命名之争。尽管这种现象在近年来已有所改变，但它仍然说明，国内的华文文学研究，是以华文书写为界定的。其关注的中心，是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传统，在文学书写中的回归与变异。而华裔的非华文书写，其核心不在语言而在创作主体的族性，更多关注的是华人族属身份所包容的文化，在异文化土壤中的隔代生存与变化，以及如何将华族的文化身份转化为一种文化资源，从而在所居国多元文化的网络中构建华族的文化地位。

四、无论国内还是海外，文化都是华文文学研究者关注的重心，只不过其侧面各有不同。中国大陆的学者最初更多的是关心海外华文书写的中华文化传承，对中华文化在异文化时空环境中的融合与变化，是近年才逐步得到重视的主题。而海外“新移民”作家，如其主要的理论发言人陈瑞琳所表述的，是在生命的“移植”中对母体文化的“放弃”和“寻找”，在摆脱“家国文化”的心理重负中，“重新审视和清算自己与生俱来文化母体，从而在新的层面上进行中西文化的对话”。^①而在王德威的“华语语系文学”观念里，是在中文书写的越界和回归中，作为一个辩证的起点，探讨“中文书写如何承载历史中本土或域外书写或经验，多元跨国的现代经验如何在歧异的语言环境中想像中国——华人——历史”。^②简言之，中国大陆学者更多注意的是文化传承与变异中的异中之“同”，而海外学者的观察，更多的是集中在文化延播与变异中的同中之“异”。

五、方法论的问题越来越受到华文文学研究者的重视，特别是比较文学方法的引入。最先将这一研究方法引入华文文学研究，同时将华文文学导入比较文学研究范畴的，是兼有着文艺学和比较文学学术背景的饶芃子教授。她的不逾余力的倡导，使华文文学研究者在视野的不断扩大大中，借鉴比较文学的方法获益良多。随着年青一代学者的不断加入，受到关注的方法论问题对华文文学研究学术质量的提升，有着重要意义。

中国大陆与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华文文学研究的某些认识上的不同，是一种客观存在。有人建议将这种认识差异称为“中国学派”。我想“派”则不必，因为中国大陆学者的认识并不一致，也在变化之中，这是一个有待丰富和完善的学科，称“派”为时尚早。但是，差异是对对象不同侧面和层面的认识，差异可能是一种“片面”，但却由此产生互补的需要，提供对话的空间，从而使对对象的认识立体化起来。

① 陈瑞琳：《“迷失”和“突围”——论海外新移民作家的文化“移植”》，载《思想文综》第10辑第236页，饶芃子主编，暨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版。

② 王德威：《华语语系文学：边界想像与越界建构》，载《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5期。

二

华文文学是一种“离散”的文学。这里所说的“离散”，是指华文文学散落在世界不同空间的存在状态。它根源于华人离开母土的世界性迁徙和生存，这是华文文学重要的发生学基础。

有一个我们习以为常的观念需要深入辨析。我们常说，华文文学是与英语文学、法语文学、德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阿拉伯语文学等相同的一种语系文学。这是就语言的世界性存在现象而言。然而有学者尖锐地指出，这种语言的世界性存在有两种情况，在诸如英语文学、法语文学等这些在“语言宗主国”之外，“世界其他地区以宗主国语言写作的文学……带有强烈的殖民和后殖民辩证色彩，都反映了19世纪以来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力量占据某一海外地区后，所形成的语言霸权及后果。因为外来势力的强力介入，在地的文化必然产生绝大的变动，而语言以及语言的精粹表现——文学——的高下异位，往往是最明显的表征。多少年后，即使殖民势力撤退，这些地区所承受的宗主国语言影响已经根深蒂固。由此产生的文学成为异国文化的遗蜕。”^①华文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流播与存在，不是“殖民宗主国”的“文化遗蜕”，其性质与此完全不同。

华文是伴随着19世纪以来华人的海外迁徙，而大量播散世界的。其时中国正面临着世界殖民主义的侵扰，迫于生计而无奈谋生异邦的华人，无论是在经济发达的国家，还是到同样处于殖民压迫下的欠发达国家，都是弱势族群，华文在华人所居国的语言和环境中的，也都是弱势语言和弱势文化。即使由于华人的刻苦奋斗，在经济发展取得成功，甚至在某些国家，华人经济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强势经济，但仍无法改变华人在所居国中语言和文化的弱势地位。这一状况无论在华人政治、经济都处于弱势的欧美诸国，或者在经济略居强势的某些东南亚国家，都是一样的。华文首先是作为移居海外的华人群保留母语的一种生存方式而存在的；其次才通过华人的文学书写，成为他们铭刻自己几近衰亡的族群记忆，再现从国内到海外的双重生存经验而获得精粹体现的。华人的华文书写，是一种母语书写，而其他受到西方殖民的国家对宗主国语言的书写，则是一种被迫的非母语的书写。即使在殖民势力溃退之后，依然无法摆脱这一后殖民的文化遗蜕。前者是伴随移民的语言移入，是移民主体对于母语的语言行为，在所居国的语言环境中，是一种弱势语言；后者则是伴随殖民而来的语言“殖民”，是殖民者强加于被殖民者的语言霸权。二者有着性质上的根本不同。

华人在海外的生存，经历了从华侨到华人再到华裔的身份变化^②。华人身份的每一变化，同时也反映在华文文学与其文化母体的错综文化关系之中。20世纪中

① 王德威：《华语语系文学：边界想像与越界建构》，载《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5期。

② 刘登翰、刘小新：《华人文化诗学：华文文学研究范式的转移》，载《东南学术》2004年第6期。

叶以前的中国海外移民，保留着“双重国籍”的政治认同，不论其是否加入移居国国籍，也不论其数代不归，都被视为中华子民，即为华侨。此时他们的文学书写，是一种华侨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海外支脉，其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是一致的。20世纪中叶以后，中国政府取消了“双重国籍”的政治认同，海外华人为了生存和发展需要，大多选择加入所居国国籍，他们的身份由华侨变为海外华人，成为所居国多民族构成的一个成分——华族。在政治认同的国籍改变之后，在文化认同上却无法完全改变，实际上存在着华人对自己母体文化与对所居国本土文化的双重认同，或者不同程度地在自己族裔文化基础上融吸所居国的本土文化，从而形成了具有所居国文化特色的华族文化。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不完全一致，是这一阶段华族文化的特点。而到他们数代之后的华裔，已经融入在所居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已趋于一致。在许多情况下，缘自他们父祖而来的无法改变的族裔文化身份，正逐渐变为一种身份文化，成为他们参与所居国多元文化建构的一种资源。无论他们用华文写作或非华文写作，他们是透过自己已经认同的所居国文化，来重新辨识和书写自身的华族文化——尽管这种“辨识”和“书写”，充满了误读和重构，却成为华裔文学书写普遍性的特征。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海外移民，成为散居于世界不同政治空间中各自独立存在的中华族裔，而反映他们生存经验的文学书写，却难以完全割断母体文化的精神脉络，在双重文化的认同、融吸和重构中，既相联系又各自独立地呈现为所居国少数族裔（华族）的文学存在。华文文学客观的这种“散存”状态，是我们观察和思考并重新进行对话、比较和整合的无可回避的事实。

三

然而，华文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是一种整合性的视野，是面对“离散”的一种想象的整合建构。

其实，所有后设的文学概念，都是一种想象的建构。从本质上说，文学书写是一种个人化的行为，每个作家都根据他独特的人生经历和审美体验，进行个人化的创造。但每个作家的个人化创造，同时又被纳入一个系统之中，不但他生活在这个社会文化的网络系统之中，从书写的语言方式，到感受的情感结构和传达的文学形态，都不能不受到这一文化网络的制约，从而使个人化的写作深烙着这一群体性的文化印记。正是作家个人化的文学书写，同时成为一种社会化的行为，才使文学研究更为普适性的想象的建构成为可能。

国家的或者区域的文学史书写，是在政治疆域的边界之内，对文学发展进行跨时间的建构。这种建构虽然有着历史书写者各自的性格和特征，但总的说来，他并不能摆脱家国叙事的背景，或者竟就是家国叙事的一个部分，一个侧面。

然而华文文学，是超越政治空间的想象，它打破疆域，是一种超地理和超时空

的整合性的想象。

中国的海外移民，使华人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散居”的族群。事实上，并非每个移居到世界任何地方的华人，都“单个”地生活着，不管他愿意或不愿意，他都生活在、或被视为生活在某个族裔的网络之中。他的肤色，他的语言，以及他的文化——从心理到行为，是一种无形的纽带，将他们“归纳”在一起；更何况还有一个有形的“唐人街”，成为他们族裔和文化存在的象征。海外华人的“散居”，实际上是一种“离散的聚合”。“离散”是相对于他们的母土，而“聚合”则是相对于他们在海外的生存方式。中华文化随着移民的携带而传播世界，也成为一种“散存”的形态。“散”是指其流播，而“存”则是一种文化延续的存在状态。海外华人是通过自己一系列的文化行为，从华文教育、华文报刊到华人社团等等，不断地实现这种族裔和文化的整合，以保存和抵御异文化环境对自己族群和文化的压迫与销蚀。在这个意义上，华文文学书写也成为一种文化政治行为，是华人对自己族裔的历史记忆与生存状态的铭刻与建构。在这种记录自己独特生存历史与经验的文学书写中，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华文文学，不仅有了自己迥异于母体的独特的性格与色彩，也有了自己自立于母体的文化与文学的价值与生命。

华文文学这一跨域建构的概念提出，包含着一个理想，那就是1989年在新加坡会议上所提出的“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因为它是“华文”的（或华人的），便有着共同的文化脉络与渊源；又因为它是“跨域”的，便凝聚着不同国家和地区华人生存的历史与经验，凝聚着不同国家和地区华文书写的美学特征和创造。它们之间共同拥有的语言、文化背景和属于各自不同的经验和生命，成为一个可以比对的差异的空间。有差异便有对话，而对话将使我们更深刻地认清自己，不仅是自己的特殊性，还有彼此的共同性。华文文学的跨域建构，就是在共同语言、文化的背景上肯定差异和变化的建构，多元的建构。每个国家和地区的华文创造，既是“他自己”，但也是“我们大家”。这就是我们所指认的“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

2007年

目 录

- 001 代序：华文文学：跨域的建构

①

- 003 命名、依据和学科定位
——华文文学研究的几点思考
- 010 关于华文文学几个基础性概念的学术清理
- 020 华人文化诗学：华文文学研究的范式转移
- 033 世界华文文学的存在形态与运动方式
——关于“一体化”和“多中心”的辨识
- 040 双重经验的跨域书写
——美华文学研究的几个关键词
- 054 都是“语种”惹的祸？

②

- 063 分流与整合：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视野
- 074 台港澳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
——再谈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视野
- 082 台湾文学：分合下的曲折与辉煌
——《台湾文学史》总论
- 118 香港文学：历史交错的绚丽画卷
——《香港文学史》导论
- 142 文化视野中的澳门及其文学
——《澳门文学概观》绪论

③

- 165 特殊心态的呈示和文学经验的互补
——从当代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看台湾文学
- 176 论台湾移民社会的形成对台湾文学性格的影响

184 历史的警示

——重读《桥》关于“建设台湾新文学”的讨论

193 论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文学及其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影响

205 台湾乡土文学论争再评识

209 从政治失落到心灵的失落

——从小说《滴仙记》看电影《最后的贵族》

215 台湾经济转型期的乡土眷恋和都市批判

——黄春明小说创作一面观

222 在两种文化的冲撞之中

——施叔青小说创作剖析

234 施叔青：香港经验和台湾叙事

——兼说世界华文创作中的“施叔青现象”

243 论台湾的现代诗运动

——一个粗略的史的考察

261 台湾新诗的当代出发

271 台湾现代诗人 23 家论札

346 台湾女诗人 12 家论札

392 《晚景》论纪弦

402 台湾的儿童诗创作

412 走向学术语境

——祖国大陆台湾文学研究 20 年

4

425 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435 香港文学的文化身份

——关于香港文学的本土性、中国性和世界性

444 论《诗风》

459 台湾作家的香港关注

——以余光中、施叔青为中心

472 余光中·香港·沙田文学

479 关于施叔青“香港三部曲”的评论

490 迅速崛起的澳门文学

5

501 中国新诗的“现代”潮流

- 513 一股不可遏制的新诗潮
- 522 “朦胧诗”：昨天和今天
- 528 会唱歌的鸢尾花
——论舒婷
- 542 中国诗坛上的“蔡其矫现象”
- 554 青春历劫，壮岁归来
——中国新诗史上受难的诗群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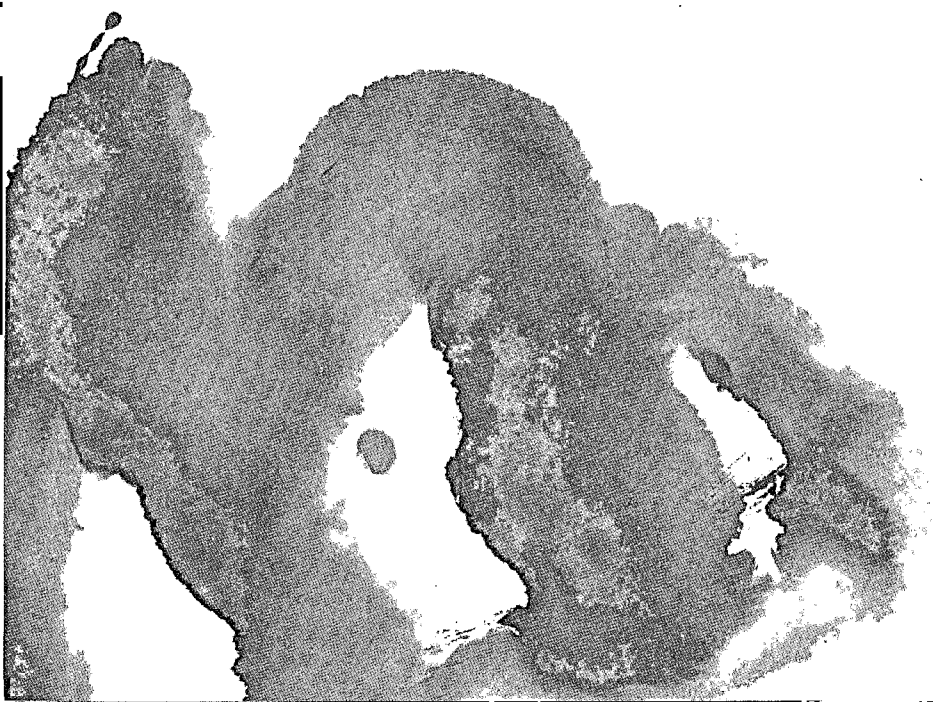
6

- 575 北美华文文学的文化主题及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
- 581 美华文学的历史开篇
——重读《苦社会》
- 593 追寻中国海外移民的民间记忆
——关于“过番歌”的研究
- 603 论《过番歌》的版本、流传及文化意蕴
- 612 精神漂泊与文化寻根
——菲华诗歌阅读札记

文学之外

- 627 传统本位的现代变奏
——兼说金门历史文化对李锡奇现代绘画的影响
- 636 台湾现代画家简论（七题）
- 650 闽台文化研究的文化地理学思考
- 661 论闽台文化的地域特征
- 678 闽台社会心理的历史、文化分析
- 698 论闽南文化
——关于类型、形态、特征的几点辨识
- 705 关于“海峡文化”的几点思考
- 717 跋：迟到学术生命的晚来良缘

1





命名、依据和学科定位

——华文文学研究的几点思考

肯定和质疑

学术自审是一个学科走向成熟的必经途径。

如果我们把 1982 年 6 月，由七个单位联合发起在暨南大学召开的第一届香港台湾文学学术研讨会^①，看作是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由个人行为走向学科建设的开始，那么，20 年后，我们重返暨南园，举行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成立大会，则意味着这一学科经过 20 年的努力，已经初具规模并正逐步为社会和学界所接受。较之 20 年前，我们看到，这一领域已经形成了一支相对稳定的、包括老中青不同年龄层次和知识背景的学术梯队；对学科所涵括的“空间”（范畴）的差异性及其性质和特征，有了基本的认识、限定和规范；对这一领域繁富的相关资料，有了初步的积累和梳理；在这一基础上，推出了一批从作家、作品、思潮、流派的专题研究，到带有整合性的文学史书写的学术成果。没有这 20 年来不止一代人的学术积累，世界华文文学作为一个新的学科为社会所接受，将是不可能的。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作为一个新的学科，华文文学研究比较于其他传统学科，还只是初步的、幼稚的和不成熟的。一个值得研味的偶合是，当人们在肯定华文文学的同时，一篇由汕头大学四位学者联合署名的全面质疑 20 年来华文文学研究的长文，在《文艺报》华馨版上加了按语发表^②，它几乎成为 20 年来没有多少争论热点的华文学界反响最为强烈的一个学术事件。尽管对该文的许多判断和立论，我难以苟同^③，但我仍然认为：肯定与质疑，这两件看似偶然，却又同步发生的事情，背后有其必然的因素。它确实反映了目前华文文学研究面临的某些困境和人们急欲突破的躁动心情。20 年来，华文文学研究从无到有，从最

① 最初联合发起召开第一届香港台湾文学学术研讨会的七个单位是：暨南大学中文系、中山大学中文系、华南师院中文系、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台港文学研究会、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福建人民出版社。

② 吴奕铨、彭志恒、赵顺宏、刘俊峰：《华文文学是一种独立自足的存在》，载《文艺报》华馨版，2002 年 2 月 26 日。

③ 刘登翰、刘小新：《都是“语种”惹的祸？》，载《文艺报》华馨版，2002 年 5 月 14 日。

基础的资料搜集到研究的展开，其成果主要体现在“空间”的拓展方面。这对于一个尚处于草创阶段的新的学科，当然是十分重要的基础性的工作。但既然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仅仅止步于平面“空间”的展开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还必须有自己的学科的理论建构，从学科的范畴（内涵、外延）、性质、特征的界定，到反映学科特质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的确立，才能开拓学科研究的深度“空间”，获得学科独具的“专业性”。对理论的长期忽视——或者说对本学科理论建构的无暇顾及，是窒碍华文文学研究突破和提高的关键。即便如企望从理论上为华文文学研究打破困局的汕头大学四位学者的文章，也同样在理论上存在许多混乱。他们对过往20年来华文文学研究指责最强烈的是文化民族主义。然而他们却对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以及与之相关的民族性、民族意识等等概念的来龙去脉、相互关系，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发展变化与影响作用，并没有做出合乎实际的界定与区分，而只是笼统地把语种写作等同于文化的民族主义，从而将20年来华文文学的创作与研究，都一概视为文化民族主义而全面否定。其粗暴和简单化的背后，不仅是学术态度的失慎，更是理论观念的失范。意在从理论上打破困局，却更深地陷入理论的困局，这不能不令我们深思。它从另一个侧面提醒我们，加强华文文学研究的理论建构已是当务之急。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感到学术自审的重要和必要。肯定是一种自审，而质疑也是一种自审。不能因为某些不恰当的、过激的批评，就放弃这种自审。因此我虽不苟同汕头大学四位学者文章的观点却认同他们质疑的意义。在肯定与质疑的辩证认识中寻找突破口，我们将走出幼稚，迈向成熟。

命名的意义和尴尬

世界华文文学的命名，有着曲折的背景和过程。最初是随着中国历史的巨大转折，人们发现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并不仅只有祖国大陆的一种形态和模式，还存在着同样属于中国文学范畴的台湾和香港的文学形态和模式。“台湾文学”和“香港文学”的命名便由此而来。这是第一届暨大会议（1982年）和第二届厦门会议（1984年）讨论的主题。由于最初向祖国大陆介绍台港文学的，主要是由台港移居海外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便也被放在台港文学之中进行讨论。但到第三届深圳会议（1986年），人们已经感到，仅只台湾和香港，还难以包容世界上诸多同样用汉语写作的文学现象。一方面是那些被放在台港文学框架中讨论的海外华文文学作家，他们的国家认同大多已经改变，再把他们放在作为中国文学之一部分的台港文学中来讨论，显然不妥；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南亚历史悠久的华文创作的复苏和活跃，逐渐进入我们关注的视野。他们由“华侨”到“华人”的身份变化，使他们较之欧美华文作家更为敏感的国家认同问题，在文学研究中同样必须慎重地处置，以免引起误解。于是从深圳会议开始，包括第四届的上海会议（1989